

日 本 学

(第 12 辑)

北京大学日本研究中心 编

北 京 大 学 出 版 社

北 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本学(第12辑)/北京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编.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12

ISBN 7-301-06916-2

.日... .北... .日本-研究-文集 .K313.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002440号

书名:日本学(第12辑)

著作责任者:北京大学日本研究中心 编

责任编辑:杜若明

标准书号:ISBN 7-301-06916-2/C·0252

出版发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网址:<http://cbs.pku.edu.cn>

电子信箱:zpup@pup.pku.edu.cn

电话: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028

排版者:北京华伦图文制作中心 82866441

印刷者:北京大学印刷厂

经销者:新华书店

850毫米×1168毫米 32开本 15印张 379千字

2003年12月第1版 2003年12月第1次印刷

定价:26.00元

本辑出版承蒙冈本常男先生资助

编委会主任：沈仁安

编委：沈仁安

贾蕙萱

刘金才

王新生

诸葛蔚东

执行主编：刘金才

前 言

《日本学》是北京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编辑的学术论文集。它的宗旨是,对日本进行综合研究,探索其与他国不同的特点,尤其是在民族性格、历史传统和深层文化方面的特点。故命名为《日本学》。

研究日本学必须站在科学的立场上,全面观察日本,而不失之偏颇,才有助于人们深刻地了解日本,客观地评价日本。《日本学》采取这种态度。

一国的特点只有在与他国的比较中才能显现出来,而且,这种比较必须是多角度、多方面、多层次的。比较的方法既可以采用人文、社会科学的一些传统方法,也应该吸取自然科学、边缘科学的新鲜方法和现代化手段。《日本学》提倡并突出比较研究、学际研究,重视新方法、新手段的运用。

科学的态度就是实事求是。按照某种主观意图去剪裁甚至曲解事实,这种削足适履式的为现实服务的方法,是不足取的。提供确切的事实和对事实的正确解释,是学术发挥其社会效益的惟一正确途径。《日本学》坚持这一原则。

日本学的定义、内涵,乃至其能否构成一个学科,人们意见未必一致。尽管如此,日本学已经成为国际学术界广泛研究的对象,并且积累了大量有价值的成果。应该积极吸取国内外各学派的日本研究成果,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不应照搬,不应人云亦云,做传声筒。历史证明,照搬、当传声筒只会扼杀创造性。《日本学》的目标是建立中国自己的日本学。

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需要全国日本研究者的坚毅的努力。《日本学》虽然主要反映北京大学日本研究所取得的成果,但它并不是狭隘的同仁出版物。《日本学》实行开放的方针,热忱欢迎国内外日本研究者在这块学术园地上发表论著,交流见解,展开争鸣。

北京大学日本研究中心《日本学》编辑委员会

目 录

“中日民间交流的未来”

- 以经济文化为中心的国际学术研讨会 张全林 (1)
- 中日友好的源泉——民间交流
- 以中日民间友好与文化交流为中心 刘德有 (2)
- 文化交流与中日关系 王晓秋 (14)
- 日中友好势力与亲台势力的斗争
- 论 1963 年周鸿庆事件 石井明 (18)
- 民间交流在战后中日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沈海涛 (35)
- 世代相传的友好与民间交流 远藤弘喜 (45)
- 发展中日民间友好交流 栗原小卷 (53)
- 三十年来日本的“汉语热” 王顺洪 刘新芝 (58)
- 浅析中日关系中相互理解问题 初晓波 (70)
- 中日民间交流的友好使者冈松庆久 南敬铭 (85)
- 从“明实录”探讨“倭寇”历史的几个问题 林景渊 (92)
- 吉田书简、日台和约与中日关系
- (1950—1952 年) 林晓光 (111)
- 对华“二十一条要求”与日英同盟 张佑如 (139)
- 东亚国际背景下的长崎事件及其影响 胡连成 (158)
- 政党政治与日本问题 王新生 (174)
- 日本法的改革理论述评 彭 勃 (191)
- 象征天皇制的形成原因再探讨 安 然 (201)
- 试论战后日本民主化改革的“逆流” 咎 涛 (218)
- 日本的能源安全政策探析 王亚宏 (234)

日本企业转移中国之经济现象分析.....	袁长军	(250)
日本经济的艰难调整与“新经济”		
——日本应如何应对经济的“全球化”	王建华	(257)
横滨开港初期的贸易状况管窥.....	张晓刚	(280)
论化政文化的反封建性和理性主义精神.....	刘金才	(292)
试论熊泽蕃山的经济伦理思想		
——以“王道经济论”为中心	李洪权	(309)
日本由本草学趋向植物学研究的转机		
——西博尔德对日本自然史研究的贡献	赵建民	(328)
当代日本社会思潮中的相对化意识.....	纪廷许	(344)
日本宪法中的教育权与受教育权.....	张允起	(361)
日本旧石器时代考古造假事件.....	徐建新	(369)
足利将军府的中国文物收藏及其书院茶道的 兴衰.....	滕 军	(389)
早期商务印书馆与日本出版商的一段合作.....	诸葛蔚东	(405)
近古美学主体的确立.....	叶渭渠	(418)
岛崎藤村与郁达夫的文学创作之比较.....	刘晓芳	(431)
中日目连故事及目连文化比较.....	张爱萍	(449)
新书介绍.....	文 刃 雨 耕	(467)
《德川时代史论》、《日本古代史研究序说》、《报德思想与中国文化》、 《战后日本舆论、学界与中国》、《武士阶级与日本的近代化》		

“中日民间交流的未来”

——以经济文化为中心的国际学术研讨会

张全林

2002年9月30日,北京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与《日本经济新闻》社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共同举办了名为“中日民间交流的未来——以经济文化为中心”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以纪念中日恢复邦交30周年。

北京大学日本研究中心是北京大学内跨学科的综合性的日本研究机构,日本经济新闻社是日本国内有着100多年历史的著名新闻媒体。此次为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30周年,两家机构协商共同举办国际学术研讨会,整合了各自的优势,实现了学术界与实业界的很好结合。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闵维方致辞,对大会的召开表示祝贺,并对与会各界朋友表示欢迎。

文化部前副部长刘德有先生、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日本经济新闻》社社长田卓彦先生、资生堂社长池田守男先生、表演艺术家栗原小卷等也做了大会发言。

此次研讨会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的热情支持,收到了许多高水平的学术论文。这里选登论文九篇,以期进一步促进学界的交流。

中日友好的源泉——民间交流

——以中日民间友好与文化交流为中心

刘德有

今年——2002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30周年,又是战后开展中日民间友好交流的50周年。我从上世纪50年代初起就参加对日友好工作,此时此刻,回首往事,怎能不浮想联翩,感慨万千?在世界形势发生巨变,中日关系出现了许多新情况的今天,回顾和重温战后中日民间友好的历史,我认为对维持两国关系的长期、健康、稳定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民间交流,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中日关系中一直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我国三代领导集体一直予以高度重视。中日两国正是经历了长期的民间友好交流,“以民促官”,推动中日关系逐步走向了正常化,从而结束了两国间长期存在的战争状态,建立了外交关系,实现了“官民并举”的局面。这一历程,是新中国同世界任何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建交史上所从未有过的。中日民间交流的历史进程有力地证明,中日友好的基础不是别的,正是广大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

新中国成立初期,日本的执政者在美国的压力下,对新生的中国采取敌视政策,然而广大日本人民却强烈要求同中国人民友好,要求早日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两国民间团体和友好人士的交流,一步一步地打破两国间的隔绝状态,逐步形成友好交往的潮流。

说到中日的民间友好往来,我们应当首先提到 1952 年春天日本三位国会议员——参议员高良富和众议员帆足计、宫腰喜助的访华。由于当时中日两国处于隔绝的状态,两国人民还不可能直接往来。日本政府不准日本公民到“共产圈国家”,对于那些自行设法来华者,回国后还要以违反“护照法”加以追究。高良富等人拿着去法国的签证,冒险取道欧洲访华,签署了第一个中日民间贸易协定。尽管它所规定的往返金额才不过 3000 万英镑,但万事开头难,历时越久,就越显示出它的重大意义和这三位日本友人在中日关系史上留下的开创性的业绩。应当说,他们是开拓中日友好处女地的先行者。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开展中日间的交往难免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疑虑,这就需要不断增进相互理解,扭转一段时期以来的民族间的不信任感。从日本方面来说,由于一些恶意和片面的宣传,不少人还很不了解新中国的真实情况和我国执行的内外政策。毛主席、周总理以及中国其他领导人多次会见来访的日本人士和各种代表团,并亲自做耐心细致的工作。特别是周总理会见了大批日本友人,而且常常与他们谈到深夜。其次,从中国方面来说,由于日本侵略者当年对中国犯下血腥罪行,群众的思想一时还转不过弯来。针对这种情况,中国共产党对人民群众进行了宣传解释和国际主义教育,把广大日本人民和一小撮军国主义分子严格地区别开来。记得 1956 年,日本商品展览会在北京举办。当时遇到的一个大难题就是挂日本国旗的问题。中国群众在感情上难以接受,他们说“一看到太阳旗,就想起日本大兵进村”。令人不能不担心会发生什么意外。周总理谆谆嘱咐有关人员说,要“向群众讲清楚,中日两国人民都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受害者,日本人民是没有责任的,日本人民是愿意同中国人民友好的,况且现在情况变了,中国和日本都不是过去的中国和日本了,应该在新的基础上,重新友好。”经过多方巨大努力,使展览会取得了圆满成功。

新中国成立后,中日关系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即民间往来;半官半民;两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以及 1998 年江泽民主席访日,两国决定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起到现在。

第一阶段,从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到 1964 年双方互设备忘录贸易办事处。这一期间,两国几乎断绝了一切官方往来,民间友好交往成为保持和发展两国关系的主要渠道。

第二阶段,1964 年中日双方互设办事处和互换记者,这是中日关系由民间往来发展到半官半民阶段的重要标志。从此以后,直到两国恢复邦交,开展的仍然是民间往来。

第三阶段,从 1972 年两国恢复邦交,到 1998 年两国决定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这一期间,中日关系揭开了新篇章,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等各个领域的交往蓬勃发展。1978 年,在邓小平副总理推动下,中日两国政府签订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从而把两国的和平友好关系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了下来。这一期间,在官方交往已成为发展两国关系的主渠道的同时,民间交往继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而其规模也远远超过了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

第四阶段是从江泽民主席 1998 年访日,两国决定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起到现在。虽然才经过短短 4 年,但在两国政府的支持和两国民间友好组织的积极推动下,中日民间友好交流又有了新发展。2000 年 1 月,新世纪的钟声刚敲响时,中国的 10 个人民团体和日本 7 个友好团体,在北京发表了《新世纪中日民间友好宣言》。时隔 1 年,2002 年 1 月,中国的 30 个团体、日本的 23 个团体总共 53 个团体的负责人齐集北京,在前一年《友好宣言》的基础上,又联合发表了要求进一步发展中日友好的《呼吁书》。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 30 周年,双方互办了“中国年”和“日本年”,开展了大量丰富多彩的纪念活动和文化交流活

动,两国人员往来大幅度增长,创下了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新纪录。

纵观这四个阶段的中日交流史,我想强调指出的一点是,不论哪个阶段,民间友好和交流,都对中日友好关系的发展发挥了重大作用。

在中日友好交流中,民间的文化交流始终占据着重要的和突出的地位。

跟中日贸易往来一样,在文化交流方面,首先签订的也是民间文化协定。这一协定是1955年11月由前社会党内阁首相片山哲率领的“拥护宪法国民联合会代表团”同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通过友好会谈,在中南海紫光阁签署的。此后,中日民间文化交流就逐渐开展起来。协定签订后的第二年,1956年3月26日,日中文化交流协会在日本宣告成立,随即同中国人民文化协会(后来是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建立了长期友好合作关系。几十年来,日中文化交流协会在中岛健藏、龟井胜一郎、宫川寅雄、井上靖、团伊玖磨等先生领导下,为促进中日邦交正常化,克服重重困难,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日邦交正常化后,特别是近年来,通过两国各方面和各友好团体的不懈努力,中日文化关系迅速发展,呈现出官民并举和多渠道(包括民间团体和个人、友好城市和商业等)、多层次、多形式的崭新局面。其中民间文化交流显得更为活跃。现在,两国的文化交流已遍及音乐、舞蹈、戏剧、绘画、书法、电影、广播、电视、图书馆、博物馆、文物、考古、新闻、出版、摄影、文学、曲艺、民俗、群众文化,以及教育、体育、卫生、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宗教、建筑等各个领域。可见,中日文化交流与合作已经获得全面发展,其范围之广、规模之大、数量之多、活动之频繁、内容之丰富等,在世界所有同中国有文化关系的国家中,都居于领先地位。

我们高兴地看到,中日表演艺术交流相当频繁。出访和来访

的艺术团组中,既有百人以上的大型团体,也有几十个人或几个人的中、小型团组以及表演艺术家。中国的话剧和京剧、昆剧、徽剧、川剧、越剧、粤剧、秦腔、吉剧、河北梆子等戏剧,以及芭蕾舞、交响乐、歌剧等都先后赴日本演出,受到观众欢迎。此外,歌舞、杂技、木偶、皮影等艺术团或小组常年在日本演出。日本的歌舞伎、狂言、能、传统舞蹈、话剧、音乐剧以及芭蕾舞、歌剧、交响乐等演出团体也经常来华演出,受到中国观众的欢迎。不仅如此,中日两国观众还能经常欣赏到对方国家的影片。

互相举办艺术展览,是中日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在日本举办过著名书画家齐白石、傅抱石、刘海粟、关山月、董寿平、李可染、李苦禅、黎雄才、启功等的绘画和书法展。日本著名画家东山魁夷、平山郁夫、加山又造、大山忠作等也先后在中国举办过画展。著名书法家柳田泰云、青山杉雨、川上景年、村上三岛、尾崎邑鹏等也在中国举办过书法展览。

文物展览和联合考古,在中日文化交流中占有较大比重。中国文物赴日本展览始于上世纪50年代,这一活动为介绍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中日邦交正常化后,文物展览和交流活动日趋活跃,内容和形式丰富多彩。《日本经济新闻》社等日本新闻单位以及一些友好团体在这一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最近十年来在日本举办的《湖北曾侯乙墓出土文物展》、《三星堆出土文物展》、《中国四大文明展》、《中国国宝展》等都获得了巨大成功。与此同时,近年来,在遵守我国有关法律、法规的情况下,联合考古、发掘和共同研究、学术交流等方面,也取得了卓有成效的合作成果。

其他方面,在艺术教育、博物馆、社会文化、少数民族文化、文化科技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以及两国青少年之间的文化交流,都有了新的开展。

现在,中日关系的发展正面临着关键的时刻。说到中日关系,

我们不能不看到在两国关系中留下了曾发生于 20 世纪、本来在《中日联合声明》中已获解决而未完全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不得被带入 21 世纪,从而给面向新世纪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增加了某些不稳定和难以预测的因素。采取怎样的措施,使中日关系的各个方面协调平衡发展,避免偶然性和突发性因素对中日关系的大局产生副作用和破坏性后果,是我们必须认真对待的重要课题。

中日关系正常化后,有一种看法认为:有了官方外交,两国的民间友好交流似乎就完成了它的使命,失去了作用。然而,实际情况恰恰相反。两国复交以后,民间外交和官方外交并存,无论在推进两国关系在各个领域继续发展,在教育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加深相互理解和信赖,消除两国间存在的一些不稳定因素,制止和反对破坏两国友好关系的活动方面,仍有它自己的活动阵地,发挥着很大的作用。毋宁说,正是由于两国的复交使人民间的友好活动有了更广阔的交流渠道,而且更加增强了这种活动的力量。

首先,我认为今后最重要的是两国人民要在坚持中日关系的原点的基础上,大力发展中日民间友好交流,特别是要大力发展文化交流。

什么是中日关系的原点?原点就是坚持《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和《中日联合宣言》,以维护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并树立正确的历史观,“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只有坚持这一原点,才能成为大力开展文化交流提供一个良好的政治环境。而有了这样良好的政治环境,又会为大力发展文化交流,创造良好的条件。例如,今年 4 月在北京举办的“栗原小卷电影作品展”就是一个很好的范例。栗原小卷女士是一位有强烈社会责任感和富有正义感的表演艺术家。这次展示的由栗原女士主演的《清凉寺钟声》等一些影片都涉及了一个重大主题:揭露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那场侵略战争的残酷和罪行。栗原女士说:“我们有责任让人们了解真实的历史,并把这段历史告诉下一代,永远不要有战争。”她还

说：“我祝愿日中两国永远和平，永远友好。”

其次，重要的是在坚持原点的基础上，要切实地增进相互理解和相互信任。而要做到这一点，也应当大力开展文化交流。因为文化交流，是心灵的交流。通过文化交流，可以超越语言的障碍，在两国人民的心灵上架起友好和相互理解的桥梁。中日两国的文化交往源远流长。两国在文化上有许多共同点，彼此很容易沟通和理解。例如，昆剧东渡，使日本观众看到这个古老剧种的旺盛生命力。有的日本观众说：“昆剧的音乐非常美，非常吸引人。我感到它与邦乐有相似之处，同时它又具有中国自己的特色。虽然剧情简单，但它细腻地刻画了人物的内心世界。”又例如日本的“狂言”剧，尽管台词是日语，但是由于贴近生活，感情相通，中国观众完全能够理解。像《捆棒》一剧，主人在出门前把两个嗜酒如命的下人的双手都用一根长棍绑上，但这两个下人趁主人不在家，仍千方百计设法开酒坛，你帮我，我帮你，痛痛快快地过足酒瘾，喝得酩酊大醉。中国观众看到他们急中生智、巧妙地偷酒喝的那些幽默、滑稽可笑的动作，不由得发出愉快的笑声。

然而，我们在看到文化上中日两国有许多共同点的同时，还应当如实地承认彼此存在着文化上的差异。从某种意义上说，中日文化是“异文化”。

我想在这里谈一个不久前在日本发生的一件真实的故事。

日本某制片人邀请中国演员到日本拍电视片。到了中午，日方的邀请单位准备了盒饭，请大家一起吃。头一两天，还相安无事，但是到了第三天，中国演员不干了，说：“为什么天天中午给我们冷饭吃。难道我们到日本来，就是为了吃冷饭？”在日本，凉吃盒饭是常识，人们都习以为常。尽管在东京的街道，偶尔也能看到出售“热盒饭”的招牌，但通常“盒饭”是凉吃的。如今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人们的生活节奏大大加快，中午吃盒饭的人也多起来，但中国的“盒饭”，无论是菜和米饭都是热腾腾的。一般来说，中国人没

有吃冷饭的习惯。从这样一个环境来的中国演员不了解日本人的习惯,误以为自己来日本受到了冷遇和慢待。日方向中方解释说,这绝不是什么歧视,日方人员中午也同样吃凉“盒饭”,希望能予以谅解,但就是说服不了中方人员,致使日方感到很为难,弄得不知所措。此事很快反映到中国驻日使馆文化参赞那里。参赞想了一个妙案,请日方每天中午再作上一个热汤,里面打上鸡蛋,使每个中国演员都能摊上一个。这样,总算把这场由生活习惯和文化差异所引起的小小风波圆满地解决了。

这仅仅是一个贴近生活的例子。再从反映民族感情和心理状态的文学作品来看,我们也能看出两国文化的差异。

最近几年,日本的俳句被翻译介绍到中国的多了起来,使中国读者对俳句逐渐感到亲近。但中国读者对日本传统俳句所要求的“季语”,未必能像日本人那样深透的了解。因为在中国的词典里,查不到“季语”一词。也许“季语”这个范畴在中国尚未形成。依我看,如果不能真正了解“季语”在俳句中所起的那种联想、比喻和象征等作用以及日本的文化背景,要想理解和欣赏俳句是非常困难的。日本有句话:“一首俳句的生与死,取决于季语”。对于这句话,中国人还不能深刻领会。举例说,正冈子规的名句

(季语是“柿”)在日本脍炙人口。中国的日本文学研究家李芒先生把它译为“方啖一颗柿,钟声悠婉法隆寺”。应该说,译文是很出色的。但中国读者读了,首先会产生疑问:为什么吃了柿子,法隆寺的钟声响了?难道吃苹果不行吗?日本人读了这首俳句,一定会感受到浓浓的秋意笼罩着奈良,并由此联想许多事。但要求中国读者也能理解到这一步,那是很难的。

谈到文化交流时,我想起曾经有一位日本朋友不无抱怨地说:“中国搞文化交流总是带有目的性”。按这位朋友的意思,应该“为文化交流而进行文化交流”。对于这样的意见,当然是不能苟同。

开展文化交流不是为了别的,正是为了友好,为了加深相互理